

读《“科教兴国”，三问三议》有感

Thoughts on “Three Questions and Three Discussions on Achieving China's Rejuvenation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唐国增

(河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 石家庄 050016)

读了孔宪铎先生《“科教兴国”，三问三议》一文，甚感畅然，深受启发。孔先生关于“科教兴国”的三问三议，事实上是提出和分析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弄明白的3个是非问题，分析精辟，发人深省。

“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前者是末，后者是本，没有“国兴科教”，就不会有“科教兴国”。如果我们的经济尚处在原始社会经济形态上，兴不兴科教倒也无所谓，然而我们的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迈进，经济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人也要现代化，兴不兴科教就不是无所谓了。科教兴则人兴，人兴则经济兴、社会兴，最终表现为国兴。科教不兴则人不兴，人不兴则国不兴。因此，抓科教就是抓人兴，抓兴国之根本。国是人之国，国随人愿，人兴则国兴。

国兴科教，一要转变观念，二要增加投入。孔先生列举的我国在科教上的微量投资状况，令人忧虑。难道我们真穷得要把孩子们的书本拿去当柴烧了吗？我看不是。正如孔先生所言，“国家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建立起教育是最佳投资意识”。转变了观念，就会有钱投向科教，就不会哭穷了，再哭穷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在科教投入上哭穷，其目的是为减少投入找理由。

“科教兴国”是春雷还是甘雨？是口号还是行动？假如仅仅是春雷，而没有甘雨；仅仅是口号，而没有行动，那么，雷声再大、口号再响，其作用等于零。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实现科教兴国，就需要加大对科教的投入，需要各级政府官员们像天下父母一样有一颗为后代发展而着想的父母心。

“科教兴国”需要知行统一，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难以统一呢？孔先生的分析一箭中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官本位体制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共和国的权源在民，而在官本位体制下，官员的权源不在民，而在官；由大官选小官，小官对大官负责，大官向更大的官负责。选官的条件之一是看小官的“政绩”。在“政绩”的指标中，经济指标是硬的，其他是软的，甚至是无。官员升迁，没有

谁在科教上考核他。于是，官员为了升迁，就必须显示自己在经济上的“政绩”（且不说这里有多少水份了！），而不是着眼于长远和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抓好振兴科教的工作。官本位体制已经成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巨大障碍。

教育经费，是投资还是消费？此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已不是个问题，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这个概念从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并论证以来，已经形成共识。但在我国，还必须就这个问题认真讨论一番，还必须做些启蒙式的投资教育工作。教育经费是投资，具体说是人力资本投资。有投入就有产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体现出比一般人力投入具有倍数作用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是：人们不断用自然力代替人的体力和脑力，人自身的体力和脑力在人力中所占的比例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即体力所占比例下降，脑力所占比例上升。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体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所占的比例大于脑力，经过漫长的生产发展，人们的脑力愈益发达，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以代替人力的自然力，发明了利用这些自然力的科技方法和生产资料。于是，能发现自然力和发明利用自然力方法的脑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终与体力持平和超过了体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脑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更是远远大于体力。然而脑力如何形成？靠教育！振兴教育，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人力内部比例结构发展的大趋势。教育投资应当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最强的基础性投资。看不到这些，就是短视，就会误国。

总之，科教兴国，关键是国兴科教。否则，科教兴国就只是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 肖庆山)